

● 世界历史

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影响因素

张 德 明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49-),男,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研究。

[摘 要] 美日的亚太经济战略和政策、两国双边贸易失衡和国际形势是影响亚太经济中美日关系的三种主要因素。其中第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后两种起重要作用。这三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变化,最后共同作用于美日关系。

[关键词] 亚太经济;美日关系;战略和政策;贸易失衡;国际形势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320-08

20世纪下半期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变化特点可分为“蜜月”期(1947年至60年代中期)、激烈摩擦期(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和摩擦与合作参半期(80年代中期至2000年)。这种关系为何时而碧空万里,时而狂风暴雨,时而半阴半晴呢?研究这一问题预测美日关系未来走向的前提。笔者认为,美日亚太经济战略和政策、两国双边贸易失衡和国际形势是导致美日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战略和政策

美日的亚太经济战略和政策是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一要素。冷战初期,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是:通过与日本结成“太平洋同盟”而主宰亚太经济^[1](P.10)。为使之得以实现,美国推行两条重要的经济政策:扶植政策和遏制政策。扶植日本恢复其“亚洲工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和平和武力的方式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亚太的扩展,确保亚洲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的安全。美国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美国的美日经济关系专家威廉·博登指出:“太平洋同盟”战略旨在既保证在经济上一个有利于美国生产者的亚洲经济形势又保证在政治上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均势^[1](P.11)。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是:利用美苏冷战将军事上的失败转化为经济上的胜利^[1](P.150);日本的天命“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本国的安全和发展由于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结成亲密的同盟而得到可靠的保证……正如美国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而现在比英国强大一样,如果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它最终将变得比美国更强大”^[2](P.9-10)。日本为实现这一战略的政策有两条:一是“一边倒”,即亲美政策;二是重返东亚经济。

从上面可清楚地看出,日本是美国亚太经济战略中的棋子,美国是日本亚太经济战略中的靠山。两国的战略和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就决定了两国在经济运作上的和谐性。在双边经济关系上,日本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就需要重进东南亚经济,这种愿望正中美国的下怀。因为:(一)为防止日本在经济

上向中国和苏联靠拢,美国主张日本与东南亚经济相结合。(二)为了降低东南亚的贫困程度,铲除所谓产生共产主义的“土壤”,美国巴不得日本这个“亚洲工场”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三)日本对东南亚的直接经济扩张就等于美国在那里的间接经济扩张。因为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过度悬殊,互补性不强,这就限制了美国对东南亚进行直接经济扩张的规模。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好处于美国和东南亚之间,日本与两者的经济互补性都强。这样,日本就利用从美国购买的原料、技术和引进的资本与本国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所制造的产品向东南亚出售。日本向东南亚出售的产品越多,对美国的原料、技术、资金的需求量就越大。(四)美国以这种方式利用日本抢占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东亚的传统市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支持日本与东南亚经济相结合,包括废除波利赔偿计划、谋划协议赔偿、支持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亚洲和国际经济组织。因此,两国在东亚市场上几乎谈不上什么竞争和摩擦。在两国双边经济关系上,美国在资金、技术、原料、市场上给日本以全力帮助,并在朝鲜战争和亚洲军事冒险中以巨款在日本采购“特需”,帮助解决了严重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美元短缺问题。美国投之以桃,日本报之以李。日本宁可买比中国和澳大利亚价高的美国原料和粮食,甚至为了让美国享有日本的粮食市场而放弃已制定的粮食自给计划^[1](P. 162)。既然双方的战略和政策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和谐“基调”,即使在某一局部问题上出现一点“杂音”(摩擦),也不会影响和谐这一主旋律。例如,由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向美国大量倾销纺织品,造成美国纺织业萎缩,美国国会意欲对日本纺织品施加进口限额,美国政府反对。国务卿杜勒斯严正指出:与日本同盟对美国来说是如此之重要以致对日本的掠夺性贸易行为不可以进行报复^[3](P. 275)。杜勒斯预见到如果美国强烈地抵制日本的倾销会发生的灾难性后果:“日本人将无疑地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发展亲密关系。”^[3](P. 276)最后以日本“自动限制”对美出口的方式平息了贸易摩擦。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被经济战略和政策所决定的关系不受其他次要问题的影响。

美日经济战略和政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由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力大为增强,遂以新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取代了旧的。以1964年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提出的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主张为基础,政府制定了“环太平洋合作”的战略构想。其内容有三:加强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个太平洋先进国家的合作;把目光转向亚洲,消除其贫困而谋求安全;以日本为“桥梁”把太平洋各国和亚洲各国连结起来^[4](第143页)。1973年8月日本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最为强调的一点是“日本在亚洲”。翌年首相田中角荣又强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主旋律将必定是在数量和质量上扩大经济和技术合作,并按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交往。”^[5](P. 80-81)美国前一个时期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尼克松政府于1970年前后对其战略做了重大调整,即从亚洲收缩力量,将战略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开始重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亚洲后提出所谓“太平洋主义”^[6](第552页)。1977年6月,美国申述亚洲政策五原则:美国(1)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亚太强国;(2)继续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3)寻求与该地区建立正常和友好的关系;(4)继续发展太平洋两岸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承认不断增长的美国 and 这一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5)以自己的影响改善亚洲诸民族的人类状况^[7](P. 73)。在此基础上,以及由于美国从印度支那的全面撤退所导致的日本在亚太的经济扩张和苏联对该地区的军事扩张,里根政府于1980年对战略再做调整,即“重返亚洲”,致力于太平洋经济合作。表面上,美日两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构想都是“太平洋经济合作”,但骨子里,两国战略是对立的。日本战略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再不依附于美国,美国战略视日本为竞争对手,再不把它作为扶植和呵护的对象;日本战略强调亚洲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战略声称要继续发展太平洋两岸经贸关系;日本战略的关键是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桥梁”作用和“重大的责任和任务”^[4](第154页),美国战略的核心是美国永远是一个亚太强国。战略和政策上的对立决定了两国在经济运作上的激烈竞争和摩擦。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美国越来越陷入困境,而日本则乘机不断扩大对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希望盟友日本用其新的财富在越战中帮助自己^[8](P. 98),日本不仅

使美国的希望落空,而且认为美国发动越战是错误的^[8](P.98)。美日在亚洲的经济关系已出现深刻的裂痕。美国认为,自己打越南战争是为日本保护东南亚市场,而日本对陷入越战困境不能自拔的美国却置之不理,只顾自己发战争之财^[8](P.98)。与此同时,两国在对东亚的商品贸易、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方面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东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的地位 and 影响都超过美国。而60年代中期以前,在东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是美国。在美日双边经贸关系上,摩擦更为频繁、激烈,这一方面留在后文详叙。

20世纪最后15年美日关系的特点是摩擦与合作参半,这明显地显示出两国经济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经济战略进一步优化。1985年日本最受尊重的政府官员小北三良(Saburo Okita)对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30年代提出的“雁行模式”进行了新的解释^[9](P.48-49),使之成了众所周知的日本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的模式,遂又成为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继续增强和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相对下降。为防止日本独霸亚太,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布什政府于1991年提出了“扇形战略”,即建立一个“类似扇形的辐射结构”的太平洋共同体。美国的“扇形战略”以美国为核心辐射亚太、防止日本独霸亚太经济;日本的“雁行战略”以日本为头雁整合东亚经济,欲将美国从中排斥出去。这是两国战略对立的一面。然而,它们还有相同的一面,即互相合作维护亚太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它们在亚太经济利益的共同需要。加上两国同属西方意识形态,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有一定的认同感,面对这一时期地区扩张主义和金融危机的威胁,合作的一面显得十分重要。美日战略的两面性决定了其合作与摩擦的两重特点。整个80年代受苏联支持的越南地区扩张主义是对东盟乃至整个亚太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对此,美日基本上采取了一致立场,以经济制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9年后,美国以民主、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予以一定程度的配合。前美驻日大使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在对华问题上的美日合作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东京一直适当及时地向我们通报情况,并且日本的具体政策措施中也没有几项使华盛顿感到不满。……他们……既维护了日本重要的对外政策和商业利益,又没有破坏与华盛顿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团结。”^[10](第139页)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日为了该地区的经济安全而合作,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双边和多边经济援助,在合作的同时也伴随着摩擦和竞争。例如,日本在与美国采取相同立场对亚洲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时为了抢先占领竞争的有利地位也搞点阳奉阴违,在美国宣布取消制裁之前就恢复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和与它们的贸易关系;两国在以合作的态度共同对付东亚金融危机时又围绕是否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问题对亚洲经济主导权开展激烈的争夺;还有不断升级的美日双边贸易摩擦等等。这些都是美日战略和政策的两面性在经济行为上的体现。

二、双边贸易失衡

双边贸易失衡,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是影响亚太经济中美日关系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美日双边贸易中,从战后至1964年,美国年年顺差。从1965年始至1985年,美国岁岁逆差,总额达1906.91亿美元^①,年均90.81亿美元。美国持续大量的贸易赤字是导致美日贸易摩擦不断的直接原因。其中几次发展成为政治冲突的贸易摩擦都是由于赤字的迅猛升高而引起的。第一次发生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1968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相当于1967年的4倍^[8](P.98),1971年又从1968年的11亿美元激增至32亿美元^[8](P.169)。大幅度上扬的赤字点燃了纺织品大战。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对输美纺织品实行自动限制,国会声称欲以立法手段对日本产品的进口施加更严厉的限制。但日本政府和纺织业界团结一致,拒不让步。双方从1969年5月至1971年9月就此问题在东京、华盛顿和日内瓦等地进行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美方在谈判中甚至以归还冲绳为条件换取日本对输美纺织品的自动限制,也无济于事。尼克松最后采取非常措施,援引《1917年与敌人贸易法》(该法严禁美国人与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奥集团贸易,违者严惩),以切断日本纺织品的对美输出相威胁^[8](P.106),并确定了

按他的条件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的最后期限。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屈服。由上可见,这场摩擦的激烈程度。美国将纺织品问题与归还冲绳问题挂钩,已经使经济问题政治化了,进而升级到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威胁日本,迫其就范。第二次发生在70年代末。1975年美国的全球经常账户为183亿美元,日本为-7亿美元,其中美对日商品贸易账户为-17亿美元。可是到1977年这三个数字依次变成-141亿美元、109亿美元和-80亿美元,1978年为-143亿美元、165亿美元和-116亿美元^[11](P.4)。也就是说,美国全球经常账户赤字1977年的56.7%和1978年的81%是与日本贸易造成的。这次严重的贸易失衡导致了两场激烈的贸易冲突。一场是农产品大战。美国要求日本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取消对美国柑橘、宾馆使用的高级牛肉及其他农产品的非关税障碍,实现柑橘、牛肉贸易自由化。美国警告日本政府:日本对美国不断增长的大量贸易顺差严重地威胁着华盛顿与东京的关系^[11](P.131)。日方对美方的要求起初坚决抵制。农林水大臣中川一良(Ichiro Nakagawa)说,要吸收美国提出的进口量,日本必须再建2.5倍的宾馆和将每个日本人的胃容量扩大一倍^[11](P.140)。日本的强硬态度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日本对外经济事务大臣丑场允彦(Nobuhiko Ushiba)赴美谈判失败后回国深有感触地说:“如今美国的反日情绪比美日纺织品谈判时更为根深蒂固。”^[11](P.139)另一场是通信产品大战。日本电话电报公司是日本通信市场对外关闭的象征。美国几次派员赴日要求该公司采购美国的通信产品都碰了一鼻子灰。1978年11月,以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为首的美国贸易专门小组访日。日本电话电报公司总裁秋草(Akigusa)不仅故意缺席事先安排的会谈,而且还以讽刺的口吻说:日本电话电报公司要从美国购买的惟一物品是“拖把和水桶”。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话激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愤怒^[12](P.112),使两国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美国强烈要求日本采取行动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参议员、联席经济委员会主席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提出为对付日本而实行进口附加税的可能性^[11](P.209),但日本坚持拒绝开放通信市场。双方的斗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80年代初,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再创新高,从1981年的157.89亿美元跃至1983年的192.89亿美元,从而引发了一场半导体大战,因为美国在这一领域内的贸易逆差特别突出:日本集成电路对美出口顺差从1980年的近28亿日元升至1983年的767亿日元^[13](第218页)。在半导体战最酣之际,首相中曾根康弘说:“美国的经济问题渊源于它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口的低智力。”美国人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然而,中曾根康弘之言却引起了日本民族的共鸣。《日本经济杂志》的社论承认:“在心灵的深处,大多数日本人民都同意首相的评价,即日本社会在某些方面处于‘较高的水平’。……尽管日本人看来一直拜倒在美国的面前,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对美国人是有些憎恨的。”^[3](P.346)除上所述之外,还有钢铁产品大战、家电产品大战、汽车大战等等无一不是由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引起的。这使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20年成为美日双边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几乎每次都由开始时的贸易摩擦变成感情上的对立然后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尽管最终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对20世纪最后15年的美日关系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美国尽管在上个时期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限制日本对美出口和增加美国对日出口的贸易协议,但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不仅未减少反而扶摇直上。从1983年的192.89亿美元升至1987年的563.26亿美元再升至1994年的656.68亿美元。因此,两国贸易摩擦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不断升温。激烈的争夺不仅发生在农产品、汽车和高科技领域,而且升级到建筑、医疗、保险等服务行业,进而深入到了经济结构层面。争夺汽车市场就是典型一例。汽车是美日长期竞争最激烈的行业,是两国摩擦的核心之所在。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2/3是汽车及其配件造成的^[3](P.388-389)。美国汽车进入日本市场的谈判进行了20个月,美国要求日本撤消对其汽车和配件业的管制规定,提高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数量,日本拒不同意。于是,美国于1995年5月掀起贸易法“301条款”,宣布若日本到6月28日不开放其市场,美国就对每年价值59亿美元的13种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日本威胁说,如果这一惩罚措施付诸实施,就向世界贸易组织告发美国^[3](P.389)。两国摩擦白热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巨额贸易赤字,美国人对日本人十分痛恨。他们毫不留情面的对日本人讲:“日本卑鄙,将我们的发明偷

去制造东西,再将产品卖回到我们的地方,使我们受到伤害,真是岂有此理!”^[14](第 57 页)正是在这种仇日的气氛中,美国国会通过了《1988 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其中“超级 301 条款”的重点目标就是日本,条款赋予美国贸易代表以直接的贸易报复权。1989 年日本国会议员、著名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共同出版了《一个可以说 NO 的日本》,书中指出:日本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基本上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尽管美国自诩其种族优越,但“现在,白人所缔造的近代文化已经面临真正的末期,我猜想这才是战后身为白人代表的美国人备感焦虑的原因。”^[14](第 38、39 页)同年 7 月,美国哈里斯民意测验(Harris poll)表明,69%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68%的人视日本经济威胁为美国最严重的外部威胁,而只有 22%的人视苏联的军事威胁为美国最严重的外部威胁^[3](P. 356—357)。在日本,时事社 1991 年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有 38%的日本人感到美国是一种威胁。外务省外围团体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从 1989 年开始,日本的反美情绪就不断积累,有可能动摇日美安全体制^[15](第 4 页)。然而,当美国对日贸易赤字减少时,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也逐步缓和。1994 年美对日贸易赤字达到最高峰,但 1995 年,据日本大藏省统计,日对美顺差为 455.6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17%,高于日本总体贸易顺差减少 11.4%的平均水平。即使按美国的统计,美对日逆差也比上年减少 9.7%,为 4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16](第 19 页)。无独有偶,1995 年 6 月两国在汽车问题上达成协议。由于汽车贸易是两国间头号摩擦“悬案”,是“一揽子经济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协议的达成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缓解。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上升,两国关系就紧张,反之,两国关系就缓和,这雄辩地说明双边贸易失衡对两国关系的重要作用。美国和日本的美日关系专家也都持同样的观点。美国学者人江昭等指出:“事实上,美日间双边贸易的失衡构成了美日经济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冲突在美国和日本都变成了政治问题。”^[8](P. 147)

为什么双边贸易失衡对美日关系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贸易摩擦是两国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第一,市场的抢占是各自国际收支的决定因素,且关系到各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居民就业乃至争占未来竞争优势地位的问题。第二,这一时期的贸易失衡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不利于美国的表现。凡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关系必然紧张。另一个问题是,为何只有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才引起两国关系的紧张,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不然呢?这是因为:第一,日本当时(1945—1964 年)是一个粮食、原料、商品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一边倒”政策,其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因此,日对美的贸易逆差是一种必然现象。第二,在双边贸易中,美对日非常照顾。根据 1953 年 9 月 15 日签订的美日商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品被允许自由进入美国;另一方面,只有美国的农产品、技术和原料被允许进入日本,且是在不与日本产品相竞争的时候^[3](P. 275)。第三,日对美的贸易逆差得到了弥补。尽管 1955—1965 年日对美贸易逆差总额达 18 463 亿日元,但由于美帮助日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使日获得对东南亚贸易顺差 13 939 亿日元,日以此弥补其对美逆差的 75.5%^②。

三、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是影响亚太经济中美日关系的第三大因素。1947 年至 60 年代中期,冷战的国际形势使美日由仇敌变成“情侣”。战后最初两年里,美国一直把日本当敌人对待,这体现在它战后初期的亚太战略构想和政策中。美国最初的战略构想是:以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为试点和重点在亚太推行新殖民主义以主宰亚太经济;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潜力以防止其东山再起,确保自己独霸亚太经济的前景不受威胁。在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对日本采取了三方面的重大措施:摧毁日本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即民主改革;实施赔偿拆迁计划;阻止日本重返亚太经济使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相结合以便控制之。同时,对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采取限制政策。美国政府指示占领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你对恢复日本经济或加强日本经济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你将让日本人民明白,你对维护日本人的任何特殊的生活水平不承担责任。”^[17](第 41 页)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盟军总部否定了日本把重工业和化学

工业作为发展和平经济的基础的想法,顽固地坚持要把日本限制在农业国或轻工业国这个发展阶段^[18](第35页)。然而,美国对日本的惩罚性战略和政策的初步实践受到世界和亚太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严峻挑战。这些变化有:冷战的爆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1947年是战后初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抛出标志着冷战的开始。从此,美苏对抗代替美苏合作,两国争夺势力范围和市场的斗争阴云从欧洲蔓延到亚洲乃至笼罩全球。同年在中国内战中,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进攻转入防御。翌年,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仍然在这一年,战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1](P.68),表现为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二次大战使美国在财富的占有和生产能力上都成为超级大国,其余国家都成了穷国。美国以年均100亿美元的贸易出超,造成外国账户上美元严重亏损,即“美元短缺”(dollar gap)的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世界经济被明显地分为软货币区和硬货币区,形成了无形的贸易壁垒。威廉·博登指出:“美元短缺是战后互为矛盾的经济力量的表现,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惟一重要的现象。在那时,很少有非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一点,到后来,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1](P.23)。很清楚,如果不解决美元短缺的问题,美国极力主张的“多边主义”的自由经贸原则就无法实现,美国的生产商和产品将被拒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之外,美国主宰世界经济的愿望就会落空,连自身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正是由于冷战、中国革命和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从政治方面考虑,在美苏争夺亚太的斗争中,美国若继续对日本推行惩罚性政策、不承担其经济复兴的责任,将会使日本发生革命,或使之投靠苏联。同时,在美国决策者的眼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因为美国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苏联和共产主义在亚太的扩张。所以,美国必须寻找新的盟友共同抵御共产主义以在亚太建立新的均势。从经济方面着想,由于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使美国通过1946年的《中美商约》所摄取的中国市场面临全部丢失的危险。倘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像中国那样获胜,则美国在亚太的势力范围和市场会进一步缩小。而且,要解决世界美元短缺问题,恢复战前亚太殖民经济体系是重要的一步。在二战前东亚通过赢得大量美元出超而长期帮助欧洲和世界,使它们的美元贸易达到平衡。但战后初期,日本与东亚贸易的崩溃使东亚在1947年的贸易赤字达12亿美元^[1](P.68—69)。可见,日本在东亚贸易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在政治上为了抗衡共产主义的扩展确保自己在亚太的既得利益,在经济上为恢复旧的亚太殖民经济体系解决美元短缺问题,美国改而与昨天的敌人日本结盟。这就是冷战时期美国从政治经济上扶植日本、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缘由。美国的政策由敌视日本转而扶植日本自然是日本求之不得的事,日本也相应地制定了“一边倒”的亲美政策。因此,两国成了“情侣”、共度“蜜月”。这一切都是世界和亚太形势变化的结果。

在第二个时期,国际形势对美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例子发生在60、70年代之交。此时国际形势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由美、苏、日、西欧和中国五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多极格局取代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亚太也出现新的形势。其一是美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日本奇迹”。日本在越来越多的制造品领域日益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与日本相反,美国的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出现“相对衰落”,国际竞争力大为削弱。亚太新形势的表现之二是美国深深地、痛苦地陷入越南战争。之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全球和亚太的新形势对美日关系以深刻的影响。美日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决定了“学生”向“老师”挑战。日本以自己强大的竞争优势无情地挤占美国国内市场和美国在东亚的市场份额,导致了两国在双边经济关系和亚太多边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越南战争是美国直接与越南交战,实际上是间接地与苏联和中国交战,因为苏、中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在与苏、中的抗衡中陷入困境的美国亟须盟友日本的援助,但日本拒绝了。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64年原子弹试验的成功,这使日本对它发展经济所依赖的美国核保护伞的作用发生怀疑,对美国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强。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乔治·凯南访问日本时,“共产党中国对日本舆论外层控制程度、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好关系的愿望、以及日本人中想至少部分地摆脱使人发腻的美国独断专行的束缚的极其自然的愿望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P. 99)正是这种复杂形势使美日矛盾尖锐化。美国认为自己腹背受敌,在政治军事上面对共产主义的明枪,在经济上遭到日本的暗算。1971 年美国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宣布:“日本人仍然在进行战争,只不过现在以经济战代替枪战。他们的近期目标就是试图主宰太平洋,然后可能是全世界。”国务院的文件将日本称为“潜在的敌人”^[8](P. 107)。在总统尼克松眼里,当他既不能按自己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又不能阻止美国经济衰退时,日本的罪过就更大了。不甘心美国衰退的尼克松因拒绝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和国内责任而决定让它的盟友——尤其是日本——为这种义务和责任作更多的付出^[8](P. 107)。于是,尼克松以“新经济政策”(即以非常的经济惩罚手段迫使日本限制对美出口和调整汇率)对付日本,以和平外交政策对待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中国和苏联。这一“尼克松冲击”被美国学者称之最富想象力的最异乎寻常的美国外交政策:“向我们的朋友宣战,向我们的宿敌让步。”^[8](P. 108)“尼克松冲击”是美日冲突白热化的表现,是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产物。

国际形势对第三时期美日关系的巨大影响也很明显。1985 年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年份。该年苏联经济实力被日本超过,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推行对美和解政策,直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使美日同盟失去了政治基础。而且,日本经济实力在 80 年代下半期进一步膨胀,美国继续相对衰落。在这种形势下,两国摩擦不断升级。然而在 90 年代初期以后,两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时发生逆转。美国经济转衰为盛,持续景气;日本经济转盛为衰,长期萧条;两国经济竞争力的对比再度发生变化。同时,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中国威胁论”的意想笼罩美日两国。在有些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两国又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对手。1994 年美日同盟“重新确认”,1998 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在此情况下经济摩擦退居次要地位。1995 年 2 月美国防部提出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写道:“不允许贸易摩擦破坏我们的安全联盟。”

综上所述,美日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双边贸易失衡(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和国际形势是影响亚太经济中美日关系的三要素。其中,经济战略和政策对美日关系起决定作用,双边贸易失衡和国际形势起重要作用。各个时期影响美日关系的不单是一个因素,至少是两个因素或者三个因素。如第一时期的“蜜月”是第一、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时期的激烈摩擦和第三时期的摩擦与合作参半是第一、二、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尼克松冲击”是受三个因素综合影响的典型例子:那时两国经济战略和政策互相对立,美对日贸易逆差与日激增、国际形势由多极取代两极,再加上越南战争。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三大要素不是相互独立而是互相影响的,如第一个时期的美日经济战略和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进而出现了美对日贸易的持续逆差。长期巨额的贸易失衡会导致两国国力的对比发生变化,国力的对比发生变化就是国际形势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际形势的变化又会促进美日调整其经济战略和政策。如 60 年代下半期和 70 年代初日美亚太经济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就是受多极格局取代两极格局之影响所致。总之,三种因素相互影响和变化最终共同作用于美日关系。既然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受制于这三种因素,因此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它们,就能预测它的未来走向。

注 释:

- ① 根据如下两本书上的数据计算:i)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Kentucky, 1989, p. 169, Table 8. 12, U. S. data on f. a. s. basis; ii) Courtenay M. Slater and Cornelia J. Straser, *Busines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9, Bernan Press, Lanham, MD, PP. 166, 167. 下文 1981 年、1983 年、1987 年和 1994 年美对日贸易赤字皆根据(ii)计算。
- ② 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77 页所引日本数据计算。

[参 考 文 献]

- [1] BORDEN William S. *The Pacific Alliance*[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 [2] NESTER William R. Japan and the Third World[M].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 [3] NESTER William R. Power across the Pacific[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日]丸山静雄. 东南亚与日本[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5] WAKAIZUMI Kei. Japa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mplication for Southeast Asia[C]. Japan as an Economic Power,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6] [澳]托马斯·艾伦. 东南亚国家联盟[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1.
- [7] KRAUSE Lawrence B.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M].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 [8] IRIYE Akira and COHEN Warren I.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M].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 [9] GARRAN Robert. Tigers Tamed[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 [10] [美]迈克尔·H. 阿马科斯特. 朋友还是对手[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 [11] DESTLER I. M. and SATO Hides. Coping with U. S. — Japanese Economic Conflicts[M].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2.
- [12] MASWOOD Syed Javed. Japan and Prote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89.
- [13] 冯昭奎,等. 战后日本外交[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4] [日]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 一个可以说 NO 的日本[M]. 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 1990.
- [15] 朱昕昌,等. 90 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影响[J]. 日本学刊, 1999, (3)
- [16] 杨伯江. 美日贸易摩擦何以缓和[J]. 现代国际关系, 1996, (3).
- [17] [英]阿姆斯特朗.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18] [日]内野达郎. 战后日本经济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Factors Influencing U. S. — Japanese Relation in Asia Pacific Economy

ZHANG De-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De-ming(194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 Rim.

Abstract: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have been influencing U. S. — Japanese relation in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first factor plays decisive role,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ones important roles. The three ones affect each other, that results in changes in themselves. All these together act on U. S. — Japanese relation in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Key words: the econom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U. S. — Japanese rel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